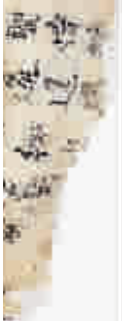


文物修复传承，与孤独为伍，与梦想同行

■唐一泓文 / 朱宇摄



逃离故纸堆的年轻人

浙江杭州，西子湖畔。

除了几家知名餐厅，孤山路还有扇并不起眼的铁门。招牌上写着“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基地”，走进这座苏州园林风味的小院，沿着木台阶踏上——栋红砖楼二层，正是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。

做古籍修复是怎样的体验？“没什么感觉，很枯燥，所以我都戴耳机。”96年出生还戴着牙套的陈泽亮，有些放不开。“你来得不是时候。”陈泽亮告诉我，他报考了中国美院的研究生，主攻美术文献学和艺术史，采访当晚考试结果即将揭晓，他有些急切。一旦考上，“走，肯定要走。”先读研再考博，毕业后进高校图书馆工作，这是陈泽亮给自己制定的人生计划。

“你走后，这里老师们怎么办？”
 “他们还很能干，也很支持我的决定。”
 “那要重新招人。”
 “不好意思，很难再招到了。”陈泽亮直言。“但这不是应该由我来思考的问题。你知道吗？我在这待了两年，看到很多人来了又走，为什么呢？我认为这是国内很多图书馆、博物馆需要思考的。”

“首先要提高待遇。”
 “然后呢？”
 “没了。”他想了想，“我觉得这只是时间问题。都说在图书馆工作清贫，清和贫是两件事。一是要耐得住寂寞，还要忍受得了工资。”陈泽亮说自己很无奈：“你问我热不热爱这个工作，我热爱。情怀是有，但情怀支撑不了多久。”
 陈泽亮刚去了趟大理大学，“那边只要博士生去，年薪30万起，还加购房补贴30万，空气好得不行了，苍山脚下，面朝洱海。”不过，他又转念一想，“欲望这种东西是永远满足不了的。”

“电视台采访时，我就一直想传达一句话，但可能你也不会写。”
 “你传吧。”

“我觉得做这行的人很不容易，比如日积月累身体的劳损。这不像纪录片里看着那么美。社会对这个行业过度关注，会带来某种偏差，大家把这个

工作神圣化了。”他有点激动，“我希望更多人看到它不好的地方，这是应当被了解的另一面。电视里修复师光鲜亮丽，仿佛不食人间烟火，上次电视台来把我拍得好像要献身于这个行业似的，难道人不吃饭不喝水吗？”

“所以你没太执着于这个工作？”
 “难道我应该甘愿吃苦和清贫？”
 陈泽亮很明确自己想要什么——改变现状，离开这里。“目前我应该回学校念书，未来，我想在喜欢的工作和报酬中找到平衡点。”

修书37载，既寂寞又丰富

对于陈泽亮的离开，他的老师兼古籍修复中心主管阎静书早有心理准备：“他在这没有正式编制，属于临时工。”两年前，在省艺术职业学院兼课的阎静书，从40多名学生里带回陈泽亮。“他对这行感兴趣，专注度也较高，我觉得他做得下来，馆里也需要年轻人。”如今，“他要走也没办法，不能耽误人家前程。这是个双向选择，心思在外面，书就修不好。”阎静书看得很淡，“我们从不挽留。”
 这不是阎静书第一次看着年轻人离开。“前两年有个小张在这待了三四年，各方面都很不错，最后也走了，也是因为编制。”没有编制，在各省省级、地县级文物单位是普遍现象。没有编制，也意味着远低于其他员工的福利待遇。“我们这起码要当编外人员3-5年，经过考核和自查，如果不接受，就说明不适合。”

阎静书的同事汪帆并不赞成这个看法：“还是要考虑现实，三五年的付出却不知道是否有结果，还要面临结婚生子买房等人生大事。”也曾当过临时工的她，对那段时间用了“绝望”二字来形容。两人最终达成一致——最好的解决之道，莫过于国家在近年来的大力财政扶持之外，再给予政策上的支持：“能考进图书馆的未必喜欢修复，能做修复的未必能考进图书馆。如果不是学历作为筛选的必要标准，把最终选择权和编制名额留给专业部门，特殊人才特殊对待，才有机会留住优秀的年轻人。”

有人离开，也有人选择坚守。上世纪80年代初入行的阎静书，已与“霉烂破书”打了整整37年交道，是浙江省内从业时间最长、也是技艺数一

数二的古籍修复师。“做我们这行除了苦练加心灵手巧，还要耐得住寂寞。外面世界的诱惑那么多，我们也不是生活在真空，总要经过几次动摇才会归于平静。”她笑言自己也曾动摇过，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，因为“修书心里很安心自在，不需和人打交道。”

尽管修书工作“寂寞无趣”，37年来，阎静书也从没把自己囿于现状，她见证、参与着修复室里的每一处变化。从最初的几支旧毛笔、几张破书桌，到如今专业的字画装裱台面、上墙板，还有显微检测设备，都是她和汪帆两人精打细算，一点点布置起来的。而在修复室里最壮观的两组收纳柜，是由他们的“实干家”老馆长牵头创意设计，收藏着馆内几代修复师从全国各地购买的手工纸张两百余种，用料颜色厚薄均不相同，用来配合不同材质的文献修复。

让阎静书和同事们更自豪的是，2014年来，他们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纸张进行调查采样，检测了19个省份、25家传统手工纸生产商107种纸样，从中选择了11个省份的17种适用于古籍修复的纸张进行采购，并将其中146种纸张进行进一步分类、编码，配以实物出版，这也是国内唯一一部附有实物对照的修复工具书。

如今，浙图古籍修复中心不仅要担任对于本馆图书修复的工作，还肩负着面向全省培养人才、配送纸张的责任。无论如何，时代在进步，国家的扶植力度在加大，行业正被越来越多人认可，年轻人总会招到的。离去总是令人唏嘘的，但阎静书仍然感到乐观。“我年轻时也没那么喜欢修书，做着做着，就会发自内心地爱上这份工作。我想，大家找到彼此适合的东西，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这份工作，错过了可能遗憾终生

春节前的某个周二晚上，已经闭馆的上海博物馆内灯火通明，在明清家具展厅，马如高和徒弟贾涛准备开始一年一度的保养工作。退去了潮水般的观众，展厅里显得格外空旷，几百年前的红木家具在灯光下呈现出温润迷人的光泽。

保养工作要持续整整四天，为了不影响观众参观，都在夜里进行。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并不容易，明清家具尤其是清代家具雕刻纹饰极其复杂，



还有不少镂空，要将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到位，需要充足的耐心。

作为上海博物馆第四代木器修复师，马如高也有着和阎静书同样的苦恼。这些年来，他前后收过5个徒弟，最终都离他而去，如今只有贾涛一人。两年前，马如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，还想再招一个徒弟，至今未能如愿。

马如高给我们讲了个12年前的小故事。贾涛之前的徒弟是个80后上海小伙，刚来工作时，马如高特意关照他，如果同学问，你就说自己是修文物的，别说是木工。到了周末，小伙子同学聚会，还是忍不住吐了苦水：正在学使用刨子锯子，弄得手上全是水泡。同学问，这样还找得到女朋友？

到了下礼拜一，小伙子就再没出现在工作室，手机关机，网头在家睡觉。这份工作，他坚持了五天。马如高的师傅朱福贤说，要不再去他家做做工作吧？马如高想想还是放弃：“好像我们求人来一样，就算把他求回来了，心思不在这里有什么用？”小伙子离开后，马如高还有陆续听到他的消息——当了两年兵，退伍后就就业困难，还有意再回来修木器，马如高婉拒了。

谈及徒弟们的纷纷离开，“失落总归有一点的。我心想，接触文物是非常好的事情，更何况这工作来之不易。如果错过了，可能是终身遗憾。”马如高说。今年55岁的他老家在江苏盐城，90年代初期来到上海搞装潢，因有一身过硬的木工技术还当了领班，恰逢当时上博有一百多件家具展品亟待修复，于是被推荐进入馆内，成为第三代传人朱福贤的徒弟。

如今，当年装修队的朋友都当上老板赚了大钱，马如高还守着一堆破木头日复一日地干活，让他印象最深的一件文物——清代紫檀木雕刻成的莲叶龙纹宝座，足足花了8个月才完工，库房里还有几百件旧家具等待修复。马如高说自己并不后悔：“他们有他们的财富，可历史文化这方面就不如我。”更何况，经他手里重获新生的，都是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文物家具，这何尝不是另一种财富呢？

不与时代为敌,老行业也可以搞创新

所幸的是，贾涛尚无去意。刚而立之年的他，喜欢书法和传统文化，看起来比同龄人更稳重沉默一些。贾涛喊马如高，不叫老师，而叫师父。“拜过了师父就是师父了，是父亲的父，不是师傅的傅。”他们向我强调，这也是上博的传统之一。

过去有句老话，教会徒弟饿死师父，马如高却不以为然。“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作为师父，总是要让徒弟尽量学到更多更好，徒弟技术好了，说明我教得好。出去后人家问他跟谁学的？哦，说是跟马如高学的，我们当师父的脸上才有光彩呢。”

在上博位于龙吴路修复中心的工作室里，师徒二人就这样安安静静地相处了数年。“平时各做各的，遇到不懂的他来问我，有时候也互相量量。”马如高对眼前的这个徒弟还算满意，按百分制来算，“他80分以上吧，这已经很高啦！”马如高坦言自己是十分严格的师父，经常对



学生挑剔，“有时已经做得近乎完美了，我还要找出点毛病来，让他再努力一点，推他再往上走一步。”他说这并非苛责，“师父对徒弟每句话都是真心的，绝不会把他往水里推。”

而与此相对的是，“超过50%的馆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损害。近2000万件馆藏文物亟待修复而人员短缺的局面已如利刃高悬，数量众多的不可移动文物外，待修文物单体或者艺术价值极高的构件附属，需要文物修复专业人员的隐忧问题，也将随着对文化遗产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而呈现需求井喷之势。”

毕业于苏州艺校的贾涛也是个上海小伙，他说自己看了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，觉得挺有共鸣。但除了媒体关注多了外，这片子并没给工作带来太大改变。他的同班同学，有进入博物馆工作的，但更多的改不了行。

“我在同学中成绩算好的，买车却是最晚的。倒是原来最调皮捣蛋的同学，毕业后做生意，全班第一个买了车。”贾涛很明白，自己从事的是如何冷门的一项工作，偶尔，他也会有与时代脱节的惶恐。“也许我们不属于整个经济发展趋势的必要环节，但我还是甘愿坚守，并且希望在专业上有所建树。”

最近贾涛迷上了研究电脑绘图和三维雕刻。前几天，马如高拿来一只从他师傅那得到的雕花墨斗交给徒弟，让他照着做只仿品，并用电脑雕刻，有意试试他的技术。成品出来，马如高颇为满意。贾涛想拿给我们看，半天没寻见，再一看，墨斗已经被师傅精心做了几日，乍一看还以为是个老物件，两人哈哈大笑。

“现在3D打印很火，以后利用到文物修复领域将是一个趋势。在电脑雕刻的基础上再进行手工修饰，可以省去很大一部分人工，提高效率。”马如高很开明，“当然传统手工艺是绝对不能丢的。”

贾涛和师父想法一致：坚守的同时，也要跟

上时代的脚步。他引用了《荀子·劝学》中的一句话：君子生非异也，善假于物也。“只有善于利用工具，不要与时代和科学为敌，顺应潮流而行，才能创新技艺，让行业进步。”而这，大概正是传承的意义吧。

高校也苦恼：学生多师资少

除了博物馆图书馆的馆内师徒模式，如今，高校也成为了修复技艺传承的重要基地。据资料显示，“2005年起，上海、北京、南京、西安等地的院校相继设立文物修复相关专业。全国有文物修复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超过25所。”然而，师资力量、生源招募、就业等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。存在于高校里的文物修复教育，又是怎样一番光景？我们在复旦文博系古陶瓷修复工作室找到了答案。

尽管已是寒假，文博系高级实验师俞惠和学生周瑞旻仍在工作室里忙碌。俞惠是毕业于复旦文博系的硕士，主攻古陶瓷修复，目前教授本科生文物修复选修课。而她的学生周瑞旻，则来自上海大学的研二在读，曾在湖南省考古所实习，本科就读于视觉艺术学院。俞惠曾是她的带教老师，因此做研究生论文时，被上大的导师又“托付”给了俞惠，在复旦进行实习。如此说来，周瑞旻算得上是“三校一馆联合培养”的成果。

春节将近，泡在工作室里的俞惠和周瑞旻，一个刚从冗繁的行政工作中解脱出来，一个离回老家时间尚早，一心惦记着写论文。这对师生正在尝试用新型的水性材料，代替以往有害的挥发性试剂，对陶瓷碎片进行粘着与补绘。“我对材料调配比较有研究，她的艺术功底好，我们也是互相学习。”一只小小的瓷瓶前，师生两人挨在一起埋首讨论，时而沉静时而热烈，更像一对好友。

俞惠也一直关注着高校修复人才培养的有关情况：首先是学校师资配备的缺乏，各馆所聘请来的修复传承人只能兼任教师，教学力量仍相对薄弱。其次对口就业率不高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文物遗产保护类相关专业在校生涯逾17000人，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占34.9%，年毕业生人数达4000余人。但由于编制、待遇、地域等问题，对口就业率不超过25%。尤其博物馆招聘要求通常硕士及以上学历，经公务员统一招考。陈泽亮式的困境并非个案。

正道是沧桑，未来仍可期

一份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，署名张晓彤、詹长法的《万古文物、百年树人——浅谈文物修复人才现状及教育》论文中称：2015开展的文博系统关于全国文物修复人员调研，参与调查的533家文博单位中，92%的单位认为文物修复人员配备不足。文物修复人员生存现状并不乐观——晋升空间狭窄，薪酬水平低下，职业地位偏低。

而与此相对的是，“超过50%的馆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损害。近2000万件馆藏文物亟待修复而人员短缺的局面已如利刃高悬，数量众多的不可移动文物外，待修文物单体或者艺术价值极高的构件附属，需要文物修复专业人员的隐忧问题，也将随着对文化遗产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而呈现需求井喷之势。”

问题种种，究竟作何解？俞惠已有自己的答案：一流传承人才的培养势在必行在国家研究机构里实现。院校的人才培养仅有3-5年的时间，学生必须踏入修复工作岗位，经前辈大师的指导和言传身教，参与重要修复项目，积累丰富经验，才能成就顶尖的修复水平。因此，高端人才培养还要依赖高等院校与一流博物馆、图书馆的通力合作。“采用馆校联合方式，将高校培养与师徒制培养结合起来，或许可以成为日后培养优秀力量的有效途径。”

俞惠的古陶瓷修复选修课，每年只开放20人名额，在系内颇为抢手。她也常常“忽悠”一些谈文物保护或材料分析的研究生来工作室，“我说你们有空就来玩玩吧，上手多体验，认知就会全面很多，可有的人慢慢就不来了。”她笑了起来。对她来说，最好的局面，并非课上学子济济一堂——主要也坐不下，而是这个工作室能够物尽其用，不断有人来，做一些他们需要的研究，持续它的运行。

“这节课是一定要开下去的。”俞惠更希望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法，尽量为学生们铺平前路。“看起来，通过学习修复能找到一份工作的并不多，但如果能通过了解文物修复，对未来的工作有些加分，那也是很好的事。”